

西方历史学的先河——

希罗多德的《历史》

西方学者曾言：“我们所有的历史著作和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完全建立在希腊人奠定的基础上。”^①首开西方史学先河的，正是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部《历史》，便奠定了希罗多德西方“史学之父”的地位。



有关希罗多德的生平事迹记载甚少，后人仅能根据他所著的《历史》和其他古典著作中的零星材料加以推考。

一般认为，希罗多德约在公元前 484 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的海滨城市哈利卡纳苏斯。其父吕克瑟司家境殷富，是当地的望族，其叔父帕尼亚西斯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希罗多德自幼饱读诗书，才智超群，成年后曾参加推翻本邦僭主的政治斗争。公元前 454 年，其叔父被僭主杀害，希罗多德也因此被放逐。不得不避居萨摩司岛，后一度返回故国，参与推翻暴君，恢复宪政。不久，因与国人不合，又被迫出走，从此浪迹四方，直至客死他乡。他曾游历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色雷斯等地，每到一

^①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第 27 页。

处，遍览名山大川，搜罗轶事旧闻，考察民情风俗，寻访历史遗迹。

公元前 447 年，希罗多德抵达雅典，其时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如日中天，学术文化百花齐放。他对雅典的繁荣不胜仰慕，与伯里克利、苏福克斯等名人交往甚欢，亲身感受到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深切地认识到希波战争给希腊带来的巨大影响，遂萌发秉笔作史以传诸后世的志向。公元前 443 年，雅典在意大利南部的图里邑建立殖民地，希罗多德取得了该城邦的公民权。从此，他在那里潜心著书，直到公元前 424 年去世。相传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他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作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可见，其历史学家的地位在当时已得到世人的公认。

《历史》原本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成的，在西方有多种英译本。195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1985 年重版，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二

《历史》一书原不分卷，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校注家将其整理成九卷本，每卷卷首冠以希腊神话中缪司女神的名字。该书以希波战争为主线，所以又名《希波战争史》，但其内容所述并不限于这场战争。实际上，《历史》可分为两大部分：从开篇至第五卷第二十七节为前半部，作者泛论波斯帝国的扩张，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等地的状况，并提及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以第五卷第二十八节为转折，以下专门描写希波战争的经过，历述伊奥尼亚起义、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斯之战、普拉特亚之战、米卡列之战，以希腊人攻占塞斯托斯结束全书，既详述了他所知的那个世界的风俗民情和地理政治状况，又展现了希波战争的全貌。

希罗多德认为，他之所以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伟大的成就，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传诸后

世。希罗多德是以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撰述《历史》的。他表示，不管人间的城邦是大是小，他要同样地加以叙述。因为先前盛极一时的城邦，如今有许多已变得默默无闻，而当代强大的城邦在往昔却又是弱小的。可见，人间的幸福决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

《历史》第一卷描写居鲁士统一波斯、征服小亚细亚的经过。希腊人和波斯的争端由来已久，波斯人认为希腊人攻占伊里翁（即特洛伊），是他们敌视希腊人的开端。在波斯人征服了吕底亚人之后，伊奥尼亚和爱奥里斯的希腊人请求居鲁士接受他们为臣民，但居鲁士傲慢地加以拒绝。伊奥尼亚人加强联防，并决定向期巴达求援。斯巴达遣使告知居鲁士，不要触动任何希腊城邦，否则他们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居鲁士对此置若罔闻，他派大将征服了伊奥尼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并向亚述进军，攻占了富饶的巴比伦城，欲将玛撒该塔伊人也收到自己的统治之下。玛撒该塔伊人勇武善战，女王托米丽司桀骜不驯，当得知其子兵败自杀后，率举国兵马与居鲁士决一死战。结果玛撒该塔伊人取得胜利。波斯军队伤亡惨重。居鲁士本人也死于这场战争。托米丽司用革囊盛满了人血，把居鲁士的首级割下来泡在里面。关于居鲁士之死，历来说法不一。希罗多德只叙述了上面一种，因为他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可信的。

第二卷主要介绍古埃及的情况。居鲁士死后，他的儿子冈比西斯继承了王位。上台伊始，便率军远征埃及。埃及人曾自以为是全人类中最古老的民族。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办法，以便使季节的循环与历法相吻合。又最先给某些神设坛、造像、修殿，并且第一个把各种各样的图像刻在石头上。希罗多德认为，埃及人的自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接着，他叙述了古埃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沿革。米恩是埃及第一个国王，他建立了孟斐斯城。塞索斯特里斯（拉美西斯二世）第一个率领船队从阿拉伯湾沿着红海推进，征服了沿岸各个民族；他又集合一支大军，征服了大陆各个民族，于所到之处刻石立柱，赞颂自己的武功。岐欧普斯当政之时，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建造金字塔。埃及人在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统治时

期获得了自由，他们把埃及分为 12 部分，并立了 12 个国王。这些国王共同修建了一座迷宫，其精致复杂程度胜于金字塔。后来，普撒美提科斯废黜了 11 个国王，做了全埃及的主人。其子涅科斯继位后，着手修筑通往红海的运河，但完成这项工程的却是波斯国王大流士。希罗多德还写道，古埃及人分成七个阶级，他们各自的头衔是祭司、武士、牧羊人、牧猪人、商贩、通译和舵手。尽管这些内容似乎游离于全书的主题，但却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第三卷主要记述冈比西斯和大流士时期的史事。冈比西斯率领波斯大军攻占埃及，俘虏了埃及国王普撒美尼托斯，并将已故的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的尸体掘出来鞭挞焚毁。冈比西斯干了一系列渎神的勾当，又杀死自己的亲兄妹，行为近乎疯狂。波斯国内两个玛哥斯僧冒名皇兄篡夺王位，冈比西斯身死异乡。大流士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大杀玛哥斯僧。政变的参预者们讨论波斯国家的统治形式。欧塔涅斯主张废除个人独裁，实行民治。美伽比佐斯主张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来管理政权，实行寡头统治。大流士则认为，寡头政治易引起倾轧，倾轧必然产生派系，派系之争必然导致流血事件，其结果仍是独裁；而民治必然产生恶意，发生混乱，有人起而制止，便成为人民崇拜的偶像，也便成了他们的独裁君主；因此，应当遵循祖宗之法，坚持君主独裁。大流士的意见占了上风，他用谋略取得波斯王位。大流士从波斯人最高贵的家族中娶了妻子。他将国家分成 20 个领地，任命郡守来治理，并规定各民族向他交纳贡税。后来，大流士率兵征服了萨摩司，平定了巴比伦的叛乱。

第四卷介绍大流士攻打斯奇和利比亚的情况。大流士攻克巴比伦之后，又率军向斯奇提亚人进攻。斯奇提亚人骁勇善战，占据着波斯帝国的西部高原，自称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民族。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却不修筑固定的城市和要塞。该地河流纵横，水草丰茂，居民以畜牧为生，因此精于骑射，作战机动灵活。大流士首先征服盖塔伊人。有些色雷斯人未经交锋便投降了大流士。斯奇提亚人欲联合陶列卡等民族共同抵抗大流士，但不少民族却不愿卷入战

争。于是斯奇提亚人决定撤退，不与大流士的军队正面交锋，企图把波斯军队拖垮。大流士窥破其计谋，及时引兵撤退。他把美伽巴佐斯留在欧罗巴担任统帅，此外又派一支大军去攻打利比亚。

第五卷主要记述伊奥尼亚起义。大流士部将美伽巴佐斯攻克佩林托斯，进而征服色雷斯地区。阿里司塔哥拉斯率军攻打克索斯岛受挫，他担心自己在米利都的统治权会被剥夺，于是策划叛乱。他放弃在米利都的僭主地位，并放逐了伊奥尼亚其他一些僭主，以此来收买人心。他自任各城邦的统帅，并亲自去斯巴达寻求支援，遭拒绝后只好赴雅典求援。希罗多德接着详细叙述了雅典摆脱僭主统治的经过。他认为，自由和权利的平等是绝好之事。因为在僭主统治之时，与其邻邦相比，雅典人毫无优越之处可言；而一旦挣脱了暴君的统治，他们就变得英勇盖世。这些事实表明：在受到暴政压迫的时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主子，那时他们并不努力作战，而听任自己被击败；一旦他们获得自由，就人人竭其所能争先效力，把国事当做自己的事了。当阿里司塔哥拉斯到雅典时，雅典正十分强大。他们任命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率领 20 艘战舰去援助伊奥尼亚人，此事就成了希腊人和异邦人纠纷的开端。

第六卷描绘大流士入侵希腊和马拉松战役。波斯兵攻占米利都，大肆杀掠。大流士遣使向希腊各地索取“水和土”，雅典人加以拒绝。波斯大军压境，雅典十位将领率军抵达马拉松。十将军意见不一，以米尔提亚戴斯为代表的主战派占上风。他将雅典军队分为三路，重兵安置在左右两翼，中路为全军最弱的部分，避实就虚，迎战波斯大军。波斯军从中路突破雅典防线，但两翼的雅典军队却取得胜利，并合围中路的波斯军。波斯军溃败，雅典人乘胜追击，一直把他们赶到海上。

第七卷叙述波斯王薛西斯侵入希腊和铁尔摩披莱(温泉关)之役。大流士听到波斯军战败的消息，对希腊人非常恼恨，准备以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希腊和埃及，因为埃及在这一事件后不久也叛变了。但在战争还没有准备妥当之时，大流士就死了。他的儿子薛西

斯继位后，首先征服了埃及，接着准备大规模进军希腊。他在海列斯彭特海峡上架起一座桥，在阿托斯半岛上开了一条运河，将 170 万大军调集到多里司科斯。雅典人决心抵抗，把希望寄托在建立强大的舰队上，希腊极大多数城邦也都决定站在雅典一边。希腊人决定在陆上坚守铁尔摩披莱，在海上于阿尔铁米西昂布防。在铁尔摩披莱这个险要的隘口上，总共只有 300 名斯巴达人在国王列欧尼达斯的率领下进行阻击。波斯人的猛攻被击退了，后来他们找到一条小路从后面抄袭，希腊守军全部壮烈牺牲。

第八卷描叙雅典海军在撒拉米司海战中的胜利。希腊舰队在阿尔铁米西昂和波斯舰队一连交锋三次，谁也没有得手。后来希腊舰队撤至撒拉米司海湾。这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无心继续防守阿提卡，而只想在他们的地峡设防。在舰队方面，雅典的装备最好也最强，但舰队司令是斯巴达人优利比亚戴斯。当波斯军队进抵雅典后，与卫城守军发生激战，后攻克城池。希腊其他城邦的舰队都打算撤离撒拉米司，求伯罗奔尼撒人给予庇护。经过劝说，这些舰队重又集结于撒拉米司，但铁米司托克利斯还不敢轻信他们，便派一名使者去请求波斯人把归路截断。波斯舰队聚集于帕列隆，想一举全歼希腊舰队，王后极力反对也无济于事。结果，波斯舰队在撒拉米司海战中遭到空前的惨败。国王薛西斯慌忙逃走，可他仍然相信能歼灭雅典人，于是让玛尔多纽斯带领 30 万人留在帖撒利亚。

第九卷记述普拉塔伊和米利卡之役，以雅典军队攻陷塞司托斯为尾声。玛尔多纽斯率领的波斯军队从帖撒利亚出发，再度占领雅典。由于斯巴达没有派兵援助，雅典人又全部撤出城池。拉凯戴孟人怕失去雅典的海军，便派出一支援军。波斯人被迫退到贝奥提亚，希腊方面因此得以在普拉塔伊阿集中了 10.8 万兵力，而玛尔多纽斯的军队却有 35 万人。由于当时出现了一种可疑的征兆，双方都往后撤退。当玛尔多纽斯决定进攻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立即向雅典人告警。波斯的军队直攻斯巴达人，波斯的希腊同盟者则向雅典人进攻。结果玛尔多纽斯战死，波斯军队逃回营寨。斯巴达人

和铁该亚人随之猛攻其营寨，这时雅典人也把敌军击溃了。在普拉塔伊战役中，波斯将士生还者不到 3000 人。这一天，伊奥尼亚的米列卡海上也有一场鏖战，希腊舰队开到那里，把异邦人全部击溃，进而攻占了赛司托斯，然后凯旋而归。

三

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后半期，爱奥尼亚已出现一批散文纪事家。他们所载述的内容已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求真”这一点上，比之神话和史诗前进了一大步，但他们的作品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时代的痕迹，大多十分粗糙。希罗多德自然受到纪事家的影响，但《历史》一书在体例、内容上已自成一格，这表明古希腊的历史学已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历史》在西方首创叙事体。希罗多德以希波战争为全书的骨架，从战端初启到战事结束，娓娓道来，犹如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的油画。他能将大量杂乱无章的史料整理成有条有理的故事，在叙事状物方面具有前无古人的禀赋，文笔更晓畅可诵。自希罗多德之后，叙事体便成为西方编纂史书的通用体裁。尽管当代新史学五花八门，但叙事体的地位至今仍牢不可破。诚如汤普逊所言：“叙事史是最古老的一种历史，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能够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① 这或许就是《历史》魅力永存的原因吧。

《历史》视野开阔，取材宏富。希罗多德不仅描写希腊各城邦的历史，还花大量的笔墨铺叙其他国家的历史。他详细记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事件，同时也不忽视地理形势、经济活动和宗教习俗。在书中，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等国的历史都占有相当的篇幅。如在第二卷，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埃及的地理环境和民

① 汤普逊：前引书，第 30 页。

情风俗，系统地论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希罗多德颇为尊重“蛮族”的文化，认为各民族皆有所长，不应彼此歧视，以至被人诬为“亲蛮派”。

《历史》也体现了批判求真精神。希罗多德已多少认识到，历史并不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史料堆砌，它应该具有某种统一性和连贯性，史学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希罗多德对他所记录的史料具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他曾明言：“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①希罗多德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书中，他时常表明哪些是他亲眼目睹的，哪些是得之传闻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对那些在他看来并不可信的记载，他也存疑照录，这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这种批判求真的精神赋予史学庄严高贵的品质，使后世治史者仰慕不已。

希罗多德著书旨在经世致用，重视道德训诲，欲以历史为武器来达到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目的。他推崇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指出自由和权利的平等乃是雅典民富国强的根源。他厌恶暴君统治，斥责波斯的侵略行径，指出那些不可一世的暴君大凡不得善终。他注重历史的垂训作用，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古希腊罗马史学的一大特征，以至有人认为历史就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学问。

当然，《历史》一书也有明显的缺点。希罗多德的历史观是宿命论，他相信冥冥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人间的一切，因此。“神谕”之类的东西在书中俯拾皆是，全书提及朕兆竟有 35 次之多。此外，由于作者对那些遗闻轶事过于津津乐道，使全书显得有点芜杂臃肿。然而，这不过是白璧微瑕，《历史》毕竟是一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不朽史著。

(张和声)

^①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第 525 页。

西方政治史的源头——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大约 2400 年前,在古希腊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而结束了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导致各奴隶制城邦进入危机时期。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后人了解这场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他很少谈到他自己,而与他同时代或较晚的古典作家对他的记载也十分有限,就是在这有限的记载中仍存在一些分歧和疑问。比如通常所引用的马凯林努斯所写的《修昔底德传》,也不完全可信,因这位作家是公元 5 世纪人,自然减少了他报道的权威性。一般认为,修昔底德大约生于公元前 460—455 年之间,歿于公元前 400 年或稍晚一点。不过马凯林努斯说,修昔底德活了五十多岁,所以,大体上把修昔底德的生卒年代估为公元前 455—前 400 年,或许是近于真实的^①。

修昔底德生于雅典一富裕家庭,父亲奥罗鲁斯不甚知名,他家

^① N·G·L·哈蒙德等主编:《牛津古典辞典》,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第 1067 页,“修昔底德”条。

与色雷斯王室可能有亲戚关系。后来修昔底德同色雷斯一富家女子结婚,并在该地拥有一份金矿,也还有相当的势力。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瘟疫,修昔底德也感染疫病,但他侥幸存活。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年(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任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将军。这年冬天,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率军突袭爱琴海北岸雅典人的战略重镇安菲玻里,守城将领伯克利斯向驻守在近海塔索斯岛的修昔底德求援。但当修昔底德率七艘舰船赶到时,安菲玻里已落入斯巴达人手中。他虽力图补救,终不能挽回败局,为此受到驰援不力的指控。雅典当局革除其军职,并将他流放。这个不幸的遭遇使修昔底德长期地流落在异域他乡,但也使他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广泛收集资料,为他编写这次大战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如果说流放这件事客观上帮助修昔底德成为一位大史学家,想必也是符合实际的。

放逐期间,修昔底德有好多时候住在色雷斯,但他也一定到外地作过广泛的游历和访察。可以设想,他曾到过伯罗奔尼撒(南希腊)和西西里等地,了解山川形势,凭吊战场遗迹,特别是从各式人物口中蒐集第一手的资料。他自称,流亡在外“看见了双方面的一切行动,尤其是伯罗奔尼撒人方面的行动”^①。从修昔底德对战争过程描写的深入详尽、对地理知识的准确把握,便可以知道,他为写作此书倾注了多大的心力。就各种迹象来看,在战争伊始和流亡期间,修昔底德已着手编写他的史书,但该书的大部分很可能成于战后和他去世之前的短促年代。

修昔底德曾立意要把这部战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庇里犹斯占领时(公元前404年)为止”^②。不过,修昔底德并没达成他的宏愿。当写到公元前411年雅典人取得一个小的胜利以后,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讲完,叙述突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卷,第3章。

②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5卷,第3章。

然中断了。这必定是发生了意外的事故。而修昔底德的去世一般认为是在他重返雅典(公元前 403 年)之后几年的事。

修昔底德用希腊文写的这部著作,也称《雅典斯巴达战争史》,通常标题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划分为八卷,无疑是出于后人之手。自 16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所出的校译注释版本很多。196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主要根据华尔纳的英译本、并参考其他几种英译本译出,后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严格地按照编年(以夏冬交相更替纪时)顺序,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卷卷首有一简短的《引言》,表明作者自战争伊始就相信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他认为过去发生的战争,比如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战争,以及后来希腊与波斯的战争,都不及当前这场战争来得伟大,所以记述的价值也就更高。之后,他追溯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集团形成的历史,叙述他们互相争夺势力范围,终于导致这场难以避免的冲突。他指出,战争的真正起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论断迄今仍为史学界所肯定和接受。

第二卷至第五卷第二章继述公元前 431 年战争正式爆发后十年间的史事。斯巴达陆军、雅典海军各争优势。彼此为对方造成一个又一个威胁,直到安菲波里之役双方主将阵亡,而且都已打得精疲力竭,于是在公元前 421 年签订《尼西亚斯和约》(即谓“五十年和约”)。第五卷第三章至卷终所描写的历史,名曰“和平”时期,实则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而且都在作决死再战的准备。所以,修昔底德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维持和平的那一段时间包括在战争时间之内,那一定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第六卷和第七卷写到,雅典人暴露了他们的傲慢、好战和野

心，公元前 415 年大举远征西西里；虽然出师不利，主帅亚西比得因涉嫌毁坏神像事件而叛逃，但远征军开始时还是取得一些胜利。不过，当斯巴达和科林斯的援军开到时，雅典人陷入困境，终于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连继任的主帅也被斯巴达人俘虏并处死。“西西里的悲剧”写得具体、生动、翔实，表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才能。

最后的第八卷尚未全部完成。它描写雅典海上帝国还有相当的实力，其海军获得一些局部的胜利。然而，胜负终究是在陆上决定的。斯巴达不仅以其陆军频频蹂躏阿提卡半岛（所谓“狄西里亚战争”），予雅典以沉重打击，而且在波斯援助下加强其海军力量，战局日益朝着不利于雅典人的方向发展。雅典内部竞争激烈，公元前 411 年发生寡头派政变，但控制权力不久就倾覆了。修昔底德在写到雅典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势时戛然而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七年没有来得及写，这当然是一大憾事^①。

修昔底德是一位严谨、求实且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他在书中写道：“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即便如此，真实的东西还是不容易发现，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②。所以，作为历史学家就要不惮其烦地访察当事者，对所听到的东西加以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得出切实可靠的结论。他认为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史家与诗人不同，诗人引用神话故事且时常渲染夸张其主题；史家与散文纪事家也不同，后者所关心的往往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当然他们的可靠性都是经不起检查的。修昔底德这种反复强调而且身体力行的求真求实精神，并将分析批判放在重

① 希腊史家色诺芬编著《希腊史》，即上承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公元前 411 年起始述，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

②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 1 卷，第 1 章。

要地位,是他作为古代历史学家的最可贵之处。修昔底德说,如果他这部史书因缺少虚构的故事而读起来不易引人入胜,他也不大在意;他的著作并不是要投合一般人的现时兴趣,“而是想垂诸永远的”。因此,通常认为,修昔底德是批判历史学的先驱。

修昔底德在书中力图探索事件的底蕴和因果联系。他对导致战争爆发的一系列具体事件叙述得周密详尽,如伊庇丹努事件、波提狄亚事件等,但他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早有成竹在胸。在希波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的雅典帝国,以及这个帝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对一向执希腊之牛耳的斯巴达统治集团来说有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斯巴达人在召开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之后,气势汹汹地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对方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继而正式宣战。修昔底德指出,这并不是斯巴达人受其同盟国发言的影响(当然有些影响),关键是他们担心时间将对他们不利,雅典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控制之下了”^①。修昔底德在分析结束战争第一阶段的尼西亚斯和约的背景时,强调雅典和斯巴达双方都有些力不从心,很想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是主要的。加之双方的两员大将克里昂和伯拉西达战死后,主战派暂时失利,继起的两个领导人物尼西亚斯和普雷斯托安那克斯也均有罢战的要求,所以才促成了尼西亚斯和约。整个分析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修昔底德对战争与经济因素的密切关系也作了叙述。比如,科林斯人发表鼓动开战的演说,警告乃至威胁那些不够热心的内陆同盟者,“很难为他们的出口货物找到出路,也很难得到从海上输入的货物。……他们一定要看到,如果海滨强国(科林斯即是)受到牺牲的话,危险就很快地扩展到内地来,直到他们也受到威胁时为止”^②。科林斯代表的话显然不完全是花言巧语,而是有其实际内

①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1卷,第6章。

②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1卷,第9章。

容的。再如，开战第五年雅典人派出一支舰队到西西里岛去，名义上是援助有亲缘关系的林地尼人，而“真正的目的是防止各物从西方运往伯罗奔尼撒去”^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经常表现出的剖析事物的能力，使作者在众多史学家中享有一个备受赞誉的地位。不过，修昔底德有的看法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所持的不变的人性观。当他谈到他的书对于想要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战争）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的人总归是有益的时候，加上个意味深长的解释，即人性毕竟是人性。这段话只能作这样的理解：战争将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阴影，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人的本性所规定的。在另一处谈到科西拉岛上的法制遭到破坏的时候，修昔底德加了几句议论：“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总是易于犯法的”，因为人性赋有“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它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②。修昔底德对他的人性观并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发挥，可能他认为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我们并不同意笼统地谈论人性，但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在过去和将来（他没有说阶级社会中）的不可避免性、人性中潜存着一种难以制驭的欲望、它的狂放不羁甚而敢于以身试法等这类具体的看法也难以一概否定。他恐怕更多地还是看到了“性恶”那个消极方面。这对于一个有爱国（雅典）之心而生不逢辰（战乱、流放）的有识者而言，大概也是不难理解的。

修昔底德从不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神灵怪异之类在他的书里没有任何地位，但也看不出作者对宗教迷信有什么批评，如有也仅是一种怀疑而已。比如说，当尼西亚斯被围困于西西里，本来要是果断地转移还有可能改变雅典军队不利的处境，可是突然发生月蚀（公元前413年8月），很多雅典人认真看待这个兆头，占卜师说须等三个九天之后才可以考虑移动军

①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3卷，第6章。

②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3卷，第5章。

队,结果招致远征军倾覆的大祸。修昔底德在这里不无惋惜地说,尼西亚斯未免“过于相信占卜”了^①。如果说修昔底德在书中表现了可贵的无神论(或许更恰当一说是泛神论)的倾向,但他似乎并不排除命运的潜在影响,虽然他对命运的真正含意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书中谈到命运最多的地方,便是弥罗斯人同雅典入侵者的一场辩论。作为强者一方的雅典的发言者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而“你们是弱者,只要在天秤上一摆动,你们的命运就决定了”。弥罗斯人的代表则表示,命运不是偏向于哪一方的,你们雅典人多势大,有时也不一定胜利;但又说,“我们很难抵抗你们和命运”^②。这里雅典人所说的命运,强调的是弱国弥罗斯命定必将失败;而弥罗斯人所看到的命运则是无常的,强国雅典也未必就一定成功,因为战争中不能排除偶然因素的作用。可见两者对命运的看法截然不同,更何况他们的发言也并不就是修昔底德的思想。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很少正面表明作者对希腊政坛上各种重大事变和人物的看法,只是从他的叙事中或从他笔下各种人物的演说中流露出他本人的某种思想倾向。例如,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政坛上三个主要人物的态度各有不同。总的来说,他赞扬伯里克利,同情尼西亚斯,而极力批评乃至贬低克里昂。书中引述了伯里克利三篇演说,特别是第二篇即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常被视为修辞学的典范,实际上是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一番夸耀;不过在字里行间,不是也浮现着修昔底德本人的政治理想吗?诚然,也只有当伯里克利的品格和智慧能够造就修昔底德所向往的政治现实时,才会博得他如此心折。对于尼西亚斯,修昔底德一向褒扬有余,说这位将军的“军事才能超过当时代任何其他的人”,他在安菲玻里战役之后主张与斯巴达缔和,是为了让雅典

①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7卷,第5章。

②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5卷,第7章。

人在艰难困苦中得到休息，也“替自己永远留一个为国效命而始终成绩卓著的声誉”^①。无奈时乖运拙，尼西亚斯终于被主战派拖上了远征西西里之路，其后又不情愿地担当了远征军的主帅，在战斗的关键时刻优柔寡断且迷信占卜，最后导致雅典的空前败绩和他自己的杀身之祸。修昔底德以遗憾的口吻说：“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他（尼西亚斯）是最不应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②。修昔底德之所以如此同情尼西亚斯，恐怕主要不是他所称的后者“终身致力于道德的研究和实践”，而是他们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有着一致或相近的观点，他们都应归于温和的民主派之列。修昔底德批评克里昂，主要由于这位顽固主战的将军还是个典型的激进（极端）民主派。在他笔下，克里昂阻碍缔和，好战成性，煽动民众，刚愎自用，简直就是个投机取巧的小人，甚至连当一名指挥官都有点不够格。这是因为，当修昔底德亲眼看到极端的、过分的民主给母邦雅典带来重大的损害时，他不愿过多地苛责平民大众，而是将矛头指向把民众引入歧途的人物，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三

在西方古代史学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份有价值的遗产，其中有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其一，它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就这次斯巴达和雅典的两强大战而言，也只是靠了修昔底德这部独一无二的战史才得以保存其全貌。另外，围绕战争的进程，作者对双方的战略战术、自然的和人文的地理条件、城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内部的党派斗争、以及各种人物的思想性格等都作了充分的描述，在总体上它们的可信性已为后世研究者所承认。比如，开战第十二年雅典人与亚

①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5卷，第2章。

② 修昔底德：前引书，第7卷，第7章。

哥斯人、门丁尼亚人及伊利斯人订立的条约，就为近代出土的碑铭所证明。记史贵在真实可信，修昔底德以他的亲身实践开创一个“信史实录”的范例，称其有“良史之才”也并非过奖。

其二，它提供了编写历史的一项重要原则，即不仅要作调查研究，还要有分析批判。作者主张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但并不轻信资料，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有闻即录”；对他来说，一切超自然的神话、荒诞不经的传说以及宗教巫术之类的迷信，从根本上说不在历史记载之列。修昔底德确有一种怀疑传统和讲求实际的精神，所以有人说，他深受当时流行的智者派思潮的影响，颇有些像是近代的唯理主义者。但是，近代史学家如德国的尼布尔和兰克等，更进而把修昔底德说成是“客观”历史家，人们就很难同意了。因为编写历史而能不偏不倚、纯粹客观是不可能的（上面所举他对三个历史人物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标榜“客观”的史学家纵然想把这顶冠冕加在修昔底德的头上，大概也不是这位历史家所愿望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演说词占了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特色。称赞者说大部分演说词滔滔雄辩，辞章华美，堪称文学和修辞学的佳作；非议者则认为，这些演说词的真实性颇可怀疑，是否能够当作历史看待。的确，这么多的形形色色人物（有时不具名，只说某邦人士）的演说或发言作者怎能都听到呢（恐怕大部分无缘听到），即或听到的部分也未必都能如实地记录下来。对此修昔底德自己有所解释，他说：“在这部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正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这几句不虚饰、不强知的表白，是符合修昔底德的务实精神的。那末怎样处理呢？他继续说：“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